



现代译丛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新趋势与 新思维



le
f them sec.
he" rest
these g factors.
the relative facts and
ome additional factors which may
ional system.
et us first turn to population and terr.
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from 1950/51 to
four most populous of the world. Th
and as compared to the A are given in bra
the largest power in the world in 1950. Thus
1966 was 0.25 or 25 per cent of that of t
and territory 5.8 per cent of the area of th
looking at the figures one realizes at
the European members of the for
of West Germany, France
only to the a
China. Th
co, India
ewha

时事出版社

现代译丛

新趋势与新思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时事出版社

新趋势与新思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昌平东沙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27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009-077-9/D·34 定价: 3.40元

编 者 的 话

世界从未处于今天这样巨大深刻的转变之中。国家、地区、集团都在设计新的战略、策略，乃至理论、学说，有的似乎已经可见端倪，有的还在酝酿之中。在转变的大潮中，世人最为瞩目的，乃是亚太地区和苏欧世界。亚太地区有可能成为“21世纪经济、政治的重心”，在西方几乎已成定论。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在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出现的某些趋势，还可能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某种事态的“先兆”，这种趋势和先兆，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包括政治、文化，其发源地包括现在的和历史上的中国，后者，他们指的是“儒学”或“中国文化”。这一切，为振兴中华的中国人在接受挑战和寻求机会时无疑是有必要了解的。

亚洲和东亚的前景当然也同苏联的“新思维”密切相关。时至今日，对苏联“新思维”的“新”意，西方一般已无疑义，只是对其真实性、持久性等尚在辩论。在这方面，持比较肯定看法的也不乏其人，他们提出的一些论据和事实，颇为细腻，值得注意。

本辑还有一篇很有意义的文章，这便是美国著名企业家哈默博士在列宁时期的苏联经商记。哈默是西方唯一在同列宁作过亲切交谈，并在列宁亲自特许下在苏联从事企业活动的人。他在苏苏长达九年的时间里还见过托洛茨基、捷尔仁斯基、米高扬等人，同他们打过交道。这是当今不可多得的活的历史。

目 录

· 亚洲新趋势 ·

东亚实验室……〔美〕哈里·哈丁、爱德华·杰·林肯 (1)

太平洋的地区主义：前景与问题

……………〔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 (37)

亚洲的新资本主义：一幅政治肖像

……………〔美〕卢西恩·W·派伊 (54)

亚洲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美〕S·G·雷丁 (74)

日本政府机关的“东亚经济圈”设想…………… (85)

· 苏联“新思维” ·

“新思维”与苏联外交政策

……………〔美〕休厄林·比亚勒 (93)

苏联军事学说的“新思维”

……………〔美〕雷蒙德·L·加尔特霍夫 (115)

戈尔巴乔夫对联合国的新姿态与美国政策

……〔美〕爱德华·勒克、托比·特里斯特·加蒂 (145)

苏联庞大的化学战机器……………〔美〕戴维·西格尔 (167)

列宁、托洛茨基和新经济政策下的苏联

——哈默在苏联经商记…………… (175)

东亚试验室

〔美〕哈里·哈丁
爱德华·杰·林肯

提要:21世纪临近之日,也就是美国经济霸权地位和两极战略结构的战后时代行将结束之时。这一点在亚洲尤为明显。亚洲经济、技术和政治变化的速度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区都快。

世界地缘政治和商业中心正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亚洲指向改革经济和政治的压力的增强以及地区、地域性大国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国际体制即将出现。在新体制中,超级大国的支配地位将受到削弱,而经济要成为更主要的问题。亚洲可能成为美国决策人的一个试验室,在这里形成新的观念。制定出新的战略,以便应付下一世纪更为复杂和竞争更为激烈的世界。

东亚对美国的重要性已经成为80年代末常人之见了。亚洲早已超过欧洲而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美国贸易赤字中有60%是对东亚的赤字。太平洋地区把美国与世界另外三个大国——日本、中国、苏联以及一些日益重要的地区性角色联系在一起。亚洲不仅拥有丰富的传统艺术、文化和哲学,而且还拥有生气勃勃的、新颖的现代文化,其对美国产生影响的表现是亚洲移民的新浪潮和美籍亚洲人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发挥日益增大的作

本文译自1989年由美国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的《重新规划美国外交政策》一书的第七章。哈里·哈丁系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

用。反映美国被亚洲所迷住的是更经常地提到“太平洋世纪”、“东亚优势”、“太平洋挑战”以及其他一些表明世界地缘政治和贸易中心正在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提法。

尽管亚洲的重要性现在已为从事对外事务的美国人普遍承认，但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所面临的议事日程并非人人了解得那样清楚。一个原因是亚太地区幅员广大和情况复杂：在经济上，亚洲有世界上最穷的一些国家，如缅甸和老挝等，但也有一些最富的国家，如汶莱和日本等。在地理上，该地区包括南太平洋的弹丸小国、新加坡和香港这类城市国家和地区、日本和印尼这些群岛国以及中国、苏联这类多民族大帝国。从政治上说，亚洲国家包括殖民地、斯大林主义暴虐政权、军事独裁政权、自由化的专制政体以及多元化的民主政体。在文化方面，亚洲是一个既受儒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基督教影响，又受各国固有传统影响的大杂烩。

既然情况这样复杂，人们就可以理解，政府官员和政策分析家往往会按照美国在单个国家中面临的问题和机会来确定其在亚洲的议事日程。然而，这种从双边角度考虑问题的态度有时就掩盖了该地区更带普遍性的问题，从而不能把亚洲议事日程中的各个特殊事项相互紧密地贯穿在一起。

我们认为，当亚洲进入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能说明亚洲特征的是三大发展趋势。其一是，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和竞争日益增强的环境中致力于经济事务的热情在增长；其二是，在这个各种专制形式仍占统治地位的地区推动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在增长；第三是，地缘政治在亚洲的影响力更加分散，其特征是逐渐出现一些与苏联和美国并存的区域性和地方性大国，这三个趋势紧密相关，经济动力增大了自由化的许多压力，而经济的成功和政治的觉醒正使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亚太地区出现新的民族力量中心和民族主义感情。

此外，我们认为这三大趋势是不仅仅在亚洲而且还要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某种事态的先兆。本章的主要论点是：在亚洲人们

能够看到许多趋势，它们加在一起，标志着战后时代的结束，并预示着一种新的国际体制的即将出现。在这种新体制中，超级大国的支配地位会削弱，经济则成为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似乎很有可能）整个世界都在向这一方向迈进的话，那么，亚洲就可能成为美国决策人的一个试验室。在这个试验室里，他们将能够提出设想，制定战略，以对付下一世纪里情况更为复杂和竞争更为激烈的世界。

如何去适应亚洲政治经济的情况，将是美国遇到的一个挑战，然而这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尽管最近人们在议论美国的衰落，但亚洲的发展并没有驱使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或被动消极态度。美国将是亚洲出口货的最重要的一个市场，是资本和技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来源，是该地区战略均势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参加者。亚洲当前的发展趋势也不要求美国政策作出会引起损伤的改变。美国从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同大多数亚洲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和有成果的关系，并在美国的力量和美国对该地区义务之间确立了能持久的平稳关系。还有，大多数亚洲国家也希望美国同它们地区的关系能恒久不变。

但是，经济动力，政治自由化和战略复杂性，正无情地改变着现代亚洲的面貌。美国再不能指望还像战后初期那样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成为该地区的主宰。我们的亚洲伙伴将越来越有竞争力，民族主义色彩日益浓厚和独立性更强。这些新的现实情况要求我们既要在双边关系中，又要在地区关系中作调整。如果我们积极地去适应该地区正在出现的趋势，我们将发现新亚洲会提供许多良好机会以便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推进政治自由化和促进战略稳定。

经济上的迫切需要

近几十年来，东亚最引人注目的（当然也是最广为谈论的）特

点也许是经济上的卓越成就。首先是日本，其次是较小的经济实体，即“四小龙”（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一些较大的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它们都采取出口导向战略，这使它们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这些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利用迅速扩大的世界市场作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从1979~1985年间，南朝鲜出口增长占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80%。同期，台湾占近53%。它们还形成了知识力量和社会力量，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生产许可证、学术交流以及其他途径从更先进的国家迅速引进技术。

其结果是使人印象很深。日本的先进工业经济，现已超过苏联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香港和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为7000~8000美元。台湾和南朝鲜的人均收入接近4000~5000美元，超过了一些较穷的西欧国家。马来西亚和泰国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也许不久就会加入新兴工业化经济的行列。在印尼和菲律宾，尽管政府政策低效率仍是更迅速进行经济改造的严重障碍，但它们的注意力正在从初级产品的生产转向工业化的任务。过去10年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增长率发展着，城乡收入和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

亚太地区的贸易和金融交往发展也很快，但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日本。在1966~1986年的20年中，东亚国家出口的美元价值，以可观的平均年率19%增长着，大大超过世界贸易总额的年增长率。同期，该地区在美国进口物品中占的比重增加了一倍多，即由占17%增至占37%；美国对这个地区的出口，由占美国总出口额的13%增至24%。日、美公司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来源。尽管贸易、资本的流动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同美、日之间，但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联系也逐渐增多，新兴工业化经济也许很快会向不发达经济进行投资。

亚洲的经济动力，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整个地区来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国际竞争感的

增强。关注贸易平衡、市场份额、生产率以及其他经济指标的热情，补充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早先那种把注意力集中于建立政治体制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作法。这也使许多国家愈加想采取全新的政策来提高本国的生产率和竞争能力。

这种热情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莫过于东亚的共产党国家了。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明白它们的经济情况，尤其是就质量而言，远远落后于该地区其他国家。早在1978年初，中国领导人就认定，如果中国希望与其更具活力的邻国进行竞争的话，就必须对它的相对来说是自给自足的中央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越南和蒙古现在看来也正在作出同样的结论。这可从它们对市场机制、私有制和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的初步试验中看出来。尽管米·戈尔巴乔夫致力于经济“改革”的原因很多，但苏联经济的停滞和东亚经济的活力之间的耀眼对比，明显也是原因之一。北朝鲜在金日成以后，也会开始实行一种根本不同的经济战略。这一点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事是确定并保持自己在一个竞争会更加剧烈的环境中的相对优势。它们已感到要获得国外市场和吸收外资越来越困难，因为外国买主可以将其买卖从这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以求用最低的价格购得质量最高的产品，还因为外国投资者寻求最有利的投资场所展开其经营活动。技术在该地区的迅速传播，意味着一些国家必须同那些在现代科技方面一度远低于自己的对手进行竞争。对自身竞争地位日益感到焦虑的心情，又因一个新的大竞争者中国进入该地区的经济中而加重了。中国进入该地区经济会对贸易和投资产生难以捉摸的影响。

亚太地区的最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也逃脱不了严重的经济挑战。由于太平洋圈其他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和生产能力的增长，再加上几十年来贸易壁垒的消除，美国从亚太地区的进口已在美国某些市场占有很大份额，使美国不得不作出重大结构调整。

由于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现在日本也面临着重新调整的相当大的压力，并且必须寻找途径来刺激内需、向进口开放本国市场以及重新改组其出口企业。

美国近十来年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趋势也使低储蓄率和政府庞大财政赤字等这些长期存在的情况更形恶化。美国对所有主要亚洲国家和地区有着空前的外贸赤字(见表一)。由于这些赤字，美国又需要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资金大量流入，主要方式是金融证券、不动产，现在则日益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

〔表一〕

美国1980、1987年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商品贸易收支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地区	1980	1987
日本	-12183	-59825
新兴工业化经济		
香港	-2343	-6507
新加坡	1049	-2342
南朝鲜	253	-9892
台湾	-3030	-18994
中国	2591	-3413
印尼	-3994	-2952
马来西亚	-1351	-1157
泰国	447	-812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

在今后几年内，美国的这些赤字必须压缩，所以，亚洲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严重依靠美国进口货物市场的增长。由于美国经常帐目赤字要减少，它从亚洲的进口必然要下降，或者即使会增长也要比过去慢得多。为补偿对美销售减少造成的损失，亚洲经济必须增加内需，或者寻找其他愿意吸收它们日益增长的出口品的国家。日本有潜在能力吸收其中的大部分。实际上，日本

在过去两年中从该地区的进口已迅速增加。尽管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日本至今还是个有名的保护主义国家。亚洲国家制成品能打入日本市场的程度尚不清楚。

鉴于所有这些原因，大多数亚洲国家预见今后10年和10年之后在已收缩的或变化着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将会加剧。因此，政府和企业界领导人正在设法制定改变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增长以及长期维持社会所要求的繁荣的战略。不论在共产主义制度和非共产主义制度中，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减弱了，而对经济的重视程度增强了。一度曾实行严格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台湾、南朝鲜和新西兰等，正变得较为自由。这是它们对美国压力所作的反应，或者是因为它们看到更多地面向市场和减少对经济的管制对自己是有利的。即使日本也在采纳自由贸易的主张，正逐步对进口物品开放某些经济部门，尽管它还保持着许多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非关税壁垒（如对产品合格证授予有歧视性的标准、执行或明或暗的“购买国货”的政策以及不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等）因而继续使其贸易伙伴恼火。

相反，美国曾是太平洋圈一个最开放的国家，现在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更加强烈，因为它要解决空前的贸易不平衡和资本的流入问题。美国的保护主义者的要求增多了，从主张通过各种关税和非关税障碍来限制进口一直扩大到主张限制外国对美投资、对美不动产的购置以及限制向可能成为潜在竞争者的国家出口美国的先进技术。政府若想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它就可以运用1988年美国贸易法案的某些条款。国会通过的、但被总统否决了的纺织品法案所规定的限制，要比该法案将取代的那个立法规定的限制多得多。由于美国消费者和出口商都得益于开放性国际经济，所以，美国保护主义的崛起是令人遗憾的。然而，这是美国对自己面临的来自亚洲贸易伙伴的经济挑战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该地区经济动力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经济问题已成为绝大多数双边关系中的首要因素，在该地区国家同美、日的双边关系中

尤其如此。对美国来说，亚洲比较稳定的战略形势意味着它现在同该地区关系中的问题有许多是经济问题。随着美国对更加严酷的外部竞争有了情绪上的变化，它的对外贸易政策更加大力维护自身利益了，美国企图取得更多的外国市场，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市场，这种做法已经引起一系列亚洲国家的抵制和不满。所以，经济问题现在是美国对该地区双边关系议事日程上的第一项：美国想要更妥善地保护在该地区的知识产权；谋求向日本出售更多的牛肉、柑桔和大型计算机；在南朝鲜更多开展保险业务；向台湾多出售肉鸡。由于台湾正在与大陆之间发展较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中美关系中集中在台湾问题上的争吵减少了，而集中在贸易和投资问题上的争吵增多了。

日本现在处于世界第二工业经济大国的地位，美国外贸政策中的大部分中心考虑是美日关系问题。日本是个坚定执行国内工业政策的岛国，在许多领域中有效地限制着外国进入其市场的活动。日本在维持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方面也不积极发挥作用。日本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贸易行径是促成美国制定1988年贸易法的主要原因。它的这种行径如不改变，就有可能进一步破坏美国致力于自由贸易的态度，甚至危及两国间的战略关系。

再者，由于美国经济的相对作用开始缩小，该地区其他国家将日益指望日本成为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来源地。尽管日本开始松动其对外经济关系，但仍继续信奉尽量扩大出口，同时又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战略。这已导致亚洲其他国家提出多方面的强烈要求：让自己更多地进入日本市场，日本增加投资，给予更多的援助和对技术转让采取较宽大的政策。因此，经济问题上的紧张气氛在东京与中国、南朝鲜以及与东南亚的关系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经济虽使某些政治关系复杂化，但同时却又离奇地使另一些政治关系得到改善。商业成了使某些至今仍然冻结着的政治关系解冻的溶剂，尤其是对一些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毛泽东以

后的北京领导公开表明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通过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经济联系来促进国家现代化。中国庞大市场的吸引力促使潜在的贸易伙伴对北京的此种表示作出积极反应。故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同南朝鲜、台湾的贸易有了急剧的增长，从而相应地缓和了过去那种一度成为彼此关系特征的紧张气氛。中国同印尼在恢复友好关系方面不久也将取得类似和解的进展，这也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最近，中苏关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希望获得苏联的技术、市场和有关经济改革的主张。

中国并不是可以说明这种重要发展趋势的唯一例子。包括苏联、越南，甚至北朝鲜等在内的亚洲其他共产党国家，也正在透过经济联系来绕过停滞的政治关系。苏联正企图利用经济关系作为一个途径来缓和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东南亚联盟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北方领土问题上同日本之间所出现的紧张关系。越南谋求同南朝鲜、日本，甚至同台湾建立经济联系，看来这些地方的商界负责人都会欣然同意。总之，整个地区中商业上的相互作用，正在筑成一些跨越意识形态分歧的桥梁。

架桥的方法之一是建议建立新的地区性机构，来帮助消除因竞争而引起的紧张关系。人们对地区组织的这种兴趣是该地区“经济迫切需要”所产生的第三个大影响。60年代日本一位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建议成立“太平洋自由贸易区”。70年代末，日本政府官员和学术界提出更广泛的主张：建立“太平洋共同体”。这两个建议曾得到美国和澳大利亚一些专家的支持。但是，这些都是有关建立正式的政府间组织的建议，从未能实行。而且今天这些建议的吸引力实际上比几年前有所减少。

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障碍，既使发起者担心，又使潜在的成员忧虑。一些较小的国家怀疑这样一种正式的政府间组织实际上会成为一种掩盖手法以使日本或美国支配地区经济关系的地位制度化。欠发达国家，从中国到东盟成员国，再三表示，它们坚持“太平洋共同体”的主旨应是改善南北经济关系而不是只保

持现状。同时，由于经济制度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在该组织的成员问题上也难取得一致意见。是包括该地区所有国家，还是只包括市场经济国家？能不能把南、北朝鲜、中国和台湾都包括进去？什么时候苏联和越南才能符合成员国的条件？尽管普遍一致认为有扩大经济协商的必要，但在“太平洋共同体”的目标和成员问题上，目前未取得一致意见。

因而直到今天，太平洋地区合作进程的最有效方法是采取规模较小的、在性质上较为非正式的行动。在小区域的水平上，如通过东盟、南太平洋论坛和澳新密切经济关系协定等这类组织和计划，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即使在这方面也已出现困难，最明显的是无法使东盟向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方向迈进，这说明想在更大范围内搞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定会遇到种种困难。

非官方组织，如太平洋贸易和发展会议（PAFTAD）、太平洋地区经济委员会（PBEC）以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等，也促进了亚洲各国不同实业部门代表之间的非正式协商和对话，有助于建立一个跨越地区的个人联系网和提高人们对现代亚洲面临的经济问题的认识。在这方面正在日益由规模更小得多的多边或双边的论坛来加以辅助。进程的多面性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个论坛可包括分歧不大的参加者，从而克服上述有关成员资格的某些问题。

最后，该地区的经济动力促进了有关亚太地区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构问题的辩论。实际上，有三种不同战略在争相获得人们的支持。一些人拥护继续实行现在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各国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利用双边和多边谈判来减少或消除对商品、劳务和资金流动的关税和非关税性障碍。另一些人认为需要建立一种受到政府较多管理的贸易关系，在这种贸易制度下，市场占有份额、贸易量或贸易收支平衡等，均该通过主要贸易国之间的谈判来确定，同时各国政府可争相取得对自己社会最有利的条

件。还有一些人要求在愿意接受经济自由化原则的国家之间签定地区性或双边性的自由贸易协定，而给予其他国家的好处要少一些。由于过去主张自由贸易制度的美国失去了单方面确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而日本搞管制贸易十分舒心，它已成为国际经济大国；所以，解决管理国际商业的基本规则和机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紧迫了。

对美国的影响 当美国处于贸易和预算严重不平衡的时候，东亚国家的经济成了美国政策的一个严重挑战。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目标应是使美国在一个活力尽可能大的和尽量开放的地区政治经济中保持繁荣昌盛并具有竞争力。尽管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全支配那个经济体系，但它却能够在争取经济开放好处方面继续发挥主要的——的确是责无旁贷的作用。美国首要任务当然是为自己制定一套最适宜的内外经济政策。但我们也必须鼓励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地区经济繁荣承担更大的责任，支持开放性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同其他国家一道为地区协商和合作确立一个有效的基本体制。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必须通过增税、削减开支和提高储蓄率与生产率等综合办法来消除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赤字不仅对美国的经济有直接影响，而且对对外政策也同样有重大影响。高赤字若继续下去，几乎肯定要引起太平洋两岸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反之，通过减少美国同该地区的贸易赤字和降低外国资金流入美国的纯增长来减少赤字，就会缓和同亚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中的紧张气氛。

第二，我们应当继续努力维护亚洲开放性国际贸易体制，以便于商品和资金流动。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效率高、产品质量高、价格低——今天仍然有效。还有，美国希望亚洲国家能更多地吸收美国的出口品，从而使美国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必要调整时美国人生活水平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亚洲国家能够保持高增长率和对美国出口品开放市场，实际上美国就能够摆脱

现在的贸易赤字。反之，如果亚洲国家不可能、或者不愿意增加内需，或者对进口品仍保持关税性或非关税性障碍的话，那么美国的调整有更大可能带来一次大衰退、高通货膨胀，或者使美元进一步贬值。

开放性贸易体制要比受到管理的贸易，甚至比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好得多。旨在确定美国同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和保证美国出口商在国外获得一定市场份额的谈判，最终对美国消费者带来的必定是更高的物价和美国经济效率的降低。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是一个吸引人的好主意，如果把这种协议用作为全球自由化的步骤而不是把世界划分成特殊贸易集团的话。现在似有可能同美签订全面贸易条约的东亚国家并不很多。该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都大大干预国内经济，它们不大可能把这种活动减少到足以保证自由贸易安排的程度。当然，唯有香港是个例外。不过，香港经济同中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强，这就使人更加怀疑它能否同这个地区达成长期的贸易安排。而且，既然亚洲国家都在争夺美国市场，同某一国家作出特殊安排就将危及同另一些国家的关系。

如果开放性贸易体制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话，我们怎么才能最有效地维护它呢？一个先决条件是抵制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如果美国不能通过自己的榜样来领导亚洲贸易体制的话，那么，要取得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就更加困难了。的确，当美国逼迫国外进一步开放市场时，它一定要预计它的贸易伙伴不仅会抵制新的保护主义措施，而且还会要求就美国现有的非关税贸易障碍（如“购买美国货”条例等）进行谈判。美国对进入自己市场所加的某些限制可能使美国获得进入国外其他市场的手段。不过，这些措施的目标还应当是实现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而不是为美国建立起保护主义壁垒。

美国争取在亚洲建立开放市场的另外一些战略也值得仔细地重新考虑。美国在同日本和其他贸易伙伴的谈判中，不仅是提出